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

王继平◎主编

曾国藩研究

ZENG GUO FAN YAN JIU

【第 2 辑】

湘潭大学出版社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

王继平◎主编

曾国藩研究

ZENG GUOFAN YANJIU

【第2辑】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研究. 第2辑/ 王继平主编.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1128-014-2

I. 曾… II. 王… III. 曾国藩 (1811~1872) - 人物研究-文集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608 号

曾国藩研究 (第2辑)

王继平 主编

责任编辑: 阳 勇

封面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2-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web.xtu.edu.cn:8080/pub/>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5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81128-014-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转载、翻印)

《曾国藩研究》编辑委员会

- 主 办**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 顾 问** 唐浩明（岳麓书社）
- 主 编** 王继平（湘潭大学）
- 委 员**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方光华（西北大学）
李建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晓天（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刘云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
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
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
樊锦文（曾国藩研究会）
刘安定（曾国藩研究会）
胡卫平（曾国藩故里管理处）
彭先国（湘潭大学）
罗玉明（湘潭大学）
郭汉民（湘潭大学）
章育良（湘潭大学）
陈代湘（湘潭大学）
- 编辑部** 王继平 章育良 李永春 周锦涛

CONTENTS

目

录

目 录

曾国藩研究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唐浩明(1)
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异同论	罗检秋(6)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	黄顺力(18)
曾国藩治理直隶探略	迟云飞(33)
曾国藩的礼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	朱汉民 吴国荣(45)
曾国藩兄弟的土地经营	刘鹏佛(52)
曾国藩幕宾入幕变项析论(1853~1872)	凌林煌(73)
曾国藩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刘云波(98)

曾国藩与湖南军功绅士群体的兴起	许顺富(107)
论曾国藩的圣人思想	李育民(116)
论曾国藩之子女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思想	梁贵超(140)
试论曾国藩的外交观	李传斌(152)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胡卫平(161)
曾国藩与晚清书院的复兴	彭小舟(175)
从薛福成“以夷制夷”思想看其与曾国藩的师承关系	周锦涛(186)

湖湘学术文化研究

林增平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周兴樑(196)
林增平与晚清湖南历史研究	王继平(212)
叶德辉与中日文化交流	张晶萍(222)
曾纪泽与西学东渐	方红姣(230)
湘学与湘军	刘志靖 林 曦 符 静(239)

湖南社会

楚勇、湘勇与湘军的初建	丁平一(286)
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湖南初探	李传斌(292)
1900—1936年间湖南商贸与商道网络概论	尹红群(305)
清末两湖哥老会流变问题	彭先国(313)

研究生论坛

刘蓉思想研究	刘志靖(321)
论汤鹏的学术思想	姚静冰(365)

评论

旧话题,新视角

——评《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梁贵超(395)
中国慈善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慈善简史》读后	李长林(400)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唐浩明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 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得到极大的张扬。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鑫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

毛泽东说过“军队是所大学校”,此话极有道理。湘军就是没有楼房的大学,战场就是没有黑板的教室。世代代住在穷山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外还有社会,除了生存外还有信仰,除了物质外还有精神。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次质的提升,甚至飞跃。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二 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仗。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毛泽东,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去世的当年七月,此建议付诸实现。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团队观念、世界眼光,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三 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是在精神上。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二是在物质上。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也因为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湖南很快冒出一批有钱人。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漂洋出海。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著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

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四 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王闿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

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大经济出自大学问。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湖湘文化是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这一点,笔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作者:岳麓书社首席编辑)

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异同论

罗检秋

关于晚清理学经世派崛起的机缘,除了咸同政局外,其学术渊源和特色也值得注意。继乾嘉之际的汉、宋对峙之后,他们调和汉、宋,基于宋而兼采于汉,进一步为晚清学术调融推波助澜^①,曾国藩(1811—1872)、郭嵩焘(1818—1891)尤具有代表性。他们早年订交,个性、仕途不无差异,但学术取向和重心大体相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儒学的调融传统。这也是他们在晚清宋学群体中表现得务实、灵活,对西方文化比较宽容的思想基础。

咸同年间,曾国藩、郭嵩焘崇奉宋学,却像乾嘉汉学家一样崇礼、考礼,接续汉学主题。但他们不像戴震、凌廷堪那样将理学与礼学对立起来,而是调和二者,以儒家思想阐释礼学主题,又以礼学沟通汉、宋。曾、郭礼学折射出清代学术关系的变化,也很鲜明地展示了二人的思想个性。他们的礼学成就不同,但相互影响,不失为很好的参照。

以礼学沟通汉、宋

清代礼学超越前代,尤其是乾嘉汉学家尊荀子,崇礼学,与宋学家的性理之学形成鲜明对照。正如清末皮锡瑞所云:“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②后来钱穆也说:戴震“深斥宋儒以言理者”,凌廷堪“乃易之以言礼”,同时焦循、阮元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③。礼、理关系一直是清代

① 见拙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7—245页。

② 皮锡瑞:《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经学通论》(三),中华书局,1954年,第25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94页。

学者的重要论题,也折射出汉、宋关系的变化。“理、礼之别”为“汉、宋鸿沟”的说法大体反映了乾隆年间的学术流别。但嘉道以后,礼学实际上超越了汉、宋对峙,明显地受汉、宋调和的影响。汉、宋学者的论题逐渐趋同,学术方法和思想相互汲取,湖湘学术群体尤具有代表性。

宋儒没有将礼、理对立起来,但强调“礼,理也”,而落实于三纲五伦,“万物各得其理”^①。实则以理统礼,重心转向心性修养和纲常道德。乾嘉之际,一些汉学家排斥宋学,也凸显理、礼对立。但嘉道以后,汉、宋学者日益从不同的学术基点对原有学术观念进行诠释。曾国藩认为,汉学家追求的“实事求是”,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②。这种说法与此前的方东树颇为相似,但他援汉入宋,主旨不在于排斥汉学,而在于调和汉、宋。他曾致书刘蓉,“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可见对汉学方法相当重视,又云:“汉学、宋学之分,断断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③他试图发扬汉学的实证学风,又传承宋儒的性理之学,称赞刘传莹“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④。事实上,这也反映其自身的努力,而礼学正是其兼取汉、宋之长的主要途径。

正是在此学术潮流中,曾国藩早年带有明显的崇礼倾向。“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⑤他任礼部侍郎期间,遵旨奏议道光皇帝的郊配、庙祔大礼,提出道光帝“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⑥。奏疏受到朝廷的重视,也一定程度反映其礼学造诣和政务见识。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述及32位人物,较集中地反映其学术主张:

先王之道,所为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者,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

① 《周敦颐通书·礼乐第十三》,《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曾文正公全集》本(下同),第39页。

② 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文集》卷一,《曾文正公全集》,第50页。

③ 曾国藩:《致刘孟蓉》,《曾文正公书札》卷一,《曾文正公全集》,第4页。

④ 曾国藩:《汉阳刘君家传》,《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49页。

⑤ 《墓志铭》,《曾文正公全集》卷首,《曾文正公全集》,第65页。

⑥ 曾国藩:《遵议大礼疏》,《曾文正公奏稿》卷一,第1页。

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为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推顾先生,次秦文恭,亦岂无微旨哉!^①

礼学是曾氏论学的价值坐标,也是其兼采汉学的重要途径。他长期研究《礼记》及清代礼学著作,认为“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②。曾氏在戎马倥偬中校阅了王夫之的《礼记章句》等书。直到同治六年,他57岁仍在研究《仪礼》。他对张尔岐、张惠言等汉学家的礼学著作非常重视,还颇为自信地认为,“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有蒿庵之句读,张皋文之图,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入以扶掖之,则从事甚易矣!”^③他想如张尔岐一样晚年成为研究《仪礼》的大家,虽未能写成礼学专著,而调和汉、宋及崇礼取向对郭嵩焘、刘蓉、邵懿辰等人均有影响。

早年与曾、郭在岳麓书院订交的刘蓉(1816—1873)学术取向相类。他与曾、郭一起切磋论学,交流礼学心得。其往来书信中,曾国藩赞赏刘蓉“覃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从事礼学著述的计划^④。刘蓉治学带有较浓的宋学色彩,强调以宋学涵养心性,认为“求放心”的办法乃“约之于义理之途而已”^⑤。但他的心性之学仍落实于礼,自称“予读《仪礼》,郊庙邦国之大,居处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节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逾其矩。以是知圣王纲纪天下,所以范民心思耳目而纳之轨物,意义深矣!”^⑥刘蓉重视礼学的社会价值,晚年建“绎礼堂”,专心研究礼经。他偏重礼意,不满汉学家“较马、郑之异同,探名物之繁赜,嗜奇缀琐,以资证附”^⑦。不过,他仍重

①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文集》卷三,第24—25页。

② 曾国藩:《湘乡相国书》,夏忻《景紫堂全书》卷前“苔岑尺牋”,1921年刊本,第1页。

③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曾文正公全集》,第2页。

④ 曾国藩:《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七,第9页。

⑤ 刘蓉:《求放心说》,《养晦堂文集》卷一,《养晦堂文·诗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382),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年刊本,第2页。

⑥ 刘蓉:《绎礼堂记》,《养晦堂文集》卷一,第24页。

⑦ 刘蓉:《绎礼堂记》,《养晦堂文集》卷一,第26页。

视汉学家的礼学著作,如江永的《礼书纲目》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拟在此基础上著《礼经发微》,取礼制大端,如祭祀、朝聘、燕飧、冠、婚、丧、乡射之礼,据经援传,荟萃群言,阐发古代礼学的精意。因他长期陷于军政事务,学术上未能如愿。

曾、刘的学术愿望在郭嵩焘那里得以实现。在理学经世派中,郭嵩焘的礼学成就最为显著。他崇奉宋学而兼采汉学,认为两者互有长短,不可偏废。郭嵩焘重视宋学的修身功夫,并使之落实于礼学,认为《中庸》一书推阐圣人之道,而“以制礼作乐为行道之验”^①。这种观念与曾、刘二人几乎一致。就在曾国藩转重礼学之时,郭嵩焘于咸丰二年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有疑则标识简端,乃益求之注疏,讨论其源流得失,积久而疑愈多,于是求之《仪礼》、《周官》经,推测其立言之旨”。因注重礼意,他转而研究《礼记》,从“训释字词”、“离析章句”、“搁置典籍文句”等方面检讨郑玄等人的《礼记》研究,考释《礼经》的立言之旨^②。至光绪二年八月,即在他奉命出使英国之前,撰成《礼记郑注质疑》49卷^③。此书成于作者涉足洋务及回湘讲学期间,洋溢着鲜明的现实关怀,但基本上未受西礼的影响,属于传统礼学的延续。光绪年间,曾、刘均已去世,郭嵩焘踏上了使西旅程,更深入地浸染于西学西俗之中,并在思想上超越了曾、刘,而三人在咸同年间的学术倾向几乎一致。

郭嵩焘重视郑玄的礼学,视之为“二千年未有能易者也”^④,但《礼记质疑》主要针对郑注孔(颖达)疏。同时,他没有完全因袭宋学,其《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的对象就是朱熹,他也认为清代理学家王懋竑等人否定《朱子家礼》为伪作的说法是错误的。故郭嵩焘的礼学大体上超越汉、宋门户,平心衡量,兼采诸家义疏。郭嵩焘的《礼记质疑》有时不免矫枉过正,疑所不当疑,但仍受晚清士大夫的重视。陈澧、潘祖荫、李鸿章及后来有的学者对其礼学均予推许,认为他“括历代制度之大,得诸家训诂之通,卓然为礼学大师。”^⑤《礼记质疑》尊奉宋学而运用汉学方法,已见甚多,学术价值仍值得重视。

曾、郭既不像宋儒那样以理学统摄礼学,也不像一些乾嘉汉学家那样以礼代

①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② 郭嵩焘:《礼记质疑自序》,《礼记质疑》,岳麓书社,1992年,第1页。

③ 参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④ 郭嵩焘:《礼记质疑后序》,《礼记质疑》,第735页。

⑤ 柳定生:《郭嵩焘传》,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二辑,第八册,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第84页。

理。他们超越汉、宋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宋,既接续汉学家的礼学论题,运用其考据方法,又在礼学中融入宋学思想。这事实上为礼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对礼学的阐释

礼既是德性之知,又是社会规范,历代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都离不开礼,而其重心不一。宋明儒家将礼学引向心性修养。朱熹说“天理”与“人欲”之分在于是否合“礼”,但他所谓“礼”仍模糊不定,最终归宿于以“天理”统摄礼,又以“三纲”代替“天理”。乾嘉之际,少数汉学家不乏思想创见,戴震、汪中等人重视礼欲统一,缘情制礼。但在汉、宋对峙之中,绝大多数汉学家疏离宋学主题时,对儒家的德性之学缺少阐发。凌廷堪在嘉庆初年指出:“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后生礼。故仁义者,礼之质干;礼者,仁义之节文也。夫仁义非物也,必以礼为物;仁义无形也,必以礼为形。”^①这实际上涉及仁、义与礼的关系。仁、义是礼的本质,而礼则是仁、义的外在体现。如果借用儒家惯用的语言,仁、义与礼,是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嘉道以降,阮元等汉学家借鉴宋学论题,以儒家仁义观念阐释礼学。曾国藩、郭嵩焘都试图以儒家的仁义学说来阐释礼学,这方面两人的具体见解可谓同异互见。

曾国藩早年沉潜于宋学,重视内圣功夫,提倡居敬穷理,但没有流于心性空谈,而体现了从宋学回归先秦儒学的努力。他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②这与强调天理、人欲之辨的宋儒仍有所不同。礼学也是曾氏内圣修养的体现。他说:“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③他重视以礼修身,以“求阙斋”名其居,自称“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④

曾国藩深受宋学影响,重视礼教,但没有将礼学化约为礼教,而是将礼学与

① 凌廷堪:《复钱晓征先生书》,《校礼堂文集》,第221页。

② 曾国藩:《答刘孟蓉》,《曾文正公书札》卷一,第9页。

③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22页。

④ 曾国藩:《求阙斋记》,《曾文正公文集》卷一,第32-33页。

儒家仁义学说统一起来。他认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①在他看来，仁与礼是儒学不可分割的整体。“仁”偏于内圣功夫，却是“礼”的基础。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则是“仁”的外化和体现。故曾氏又说：“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②他凸显礼学的仁爱内涵，与宋儒独重“等威”，强调“礼以义起”仍有所不同。曾氏对礼学内涵的诠释基于宋学，而不限于宋学，与凌廷堪、阮元等汉学家的见解不无相同之处。

“亲亲为仁”，由仁生义，因义制礼，这是儒家礼学的主题，也是郭嵩焘阐释礼学的基本思路。他指出：“礼兼仁与义行之，得义以为之节而分严则其体强，得仁以为之本而情顺则其用尊，仁义交相为用以成礼——礼者，所以达仁义之施而立人道之准者也。”^③他认为“道兼仁义”，而“仁者中心之发，义者因事之宜。”^④在他看来，仁、义本有轩轻，仁更具有本原的性质。故他指出：“人心之爱敬因事而生，圣人制为礼以达之，故凡礼之行皆本于仁。”^⑤他肯定郑玄、阮元等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人”，也援引《说文》“仁，亲也。从二人”的解释^⑥。他凸显仁的相亲、相敬之意，注重仁的社会性。

以仁释礼的取向体现在郭嵩焘有关服制的解释中。《礼记》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对此，他否定郑注“以祖祢分轻重”的解释，而认为“仁以服制言，义以宗法言”^⑦。也就是说，服制以仁为本，由己至祖，逐渐减轻；宗法的基础则是义，故以祖为重。“由亲亲之仁上推之，以不敢忘其祖；由尊祖之义下施之，以皆知重其祢”。服制“导之于仁义之归……要其归亲亲而已。等而亲之之谓‘仁’，顺而宜之之谓‘义’。”^⑧他区分服制的仁、义含意，尤重其仁。郭嵩焘彰显礼制的“亲亲之仁”，与以往宋学家偏重尊尊之义、强调宗法制度的取向已有差异。故其礼学的归宿也不是宋儒那样以“三纲”“大义”统摄礼意。曾、郭二人对礼学的阐释都是传承宋学而又超

① 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62页。

② 曾国藩：《书仪礼释官后》，《曾文正公文集》卷四，第15页。

③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267-268页。

④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635页。

⑤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609页。

⑥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627页。

⑦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431页。

⑧ 郭嵩焘：《礼记质疑》，第434页。